

官脹揭秘

● 孫越生

如果紙幣發行量超過商品流通所需的金屬貨幣量，紙幣就會貶值，物價就會上漲，持幣人就會受到相應損失，像有一隻無形的手在向他偷竊。這就是古典學派所說的通貨膨脹規律及其主要後果。

經濟生活中的這種規律性現象，可謂婦孺皆知，並不希奇。希奇的是政治生活中也有這種規律性現象，可謂政治通脹和貶值，卻沒有被人們所覺察和為學者所闡述。

在任何政治體制下，社會為了維持公共生活也好，統治階層為了維持統治也好，在一定時期內，政府官員的數量總有一個合理的標準，即社會對於官員的需求量和供養官員的能力處於平衡點上的狀態，如同商品的總需求要和總供給平衡，貨幣流通量和商品流通量平衡的道理一樣。但是，如果官員人數不斷膨脹，超過了社會的需要和負擔的能力，形成官浮於事，僧多粥少的局面，官員就會貶

值，一個官的俸給就得由兩個以上的官來分配。中國幾千年一貫低俸制的根本原因，就在於官僚政治的膨脹長期超過了社會的限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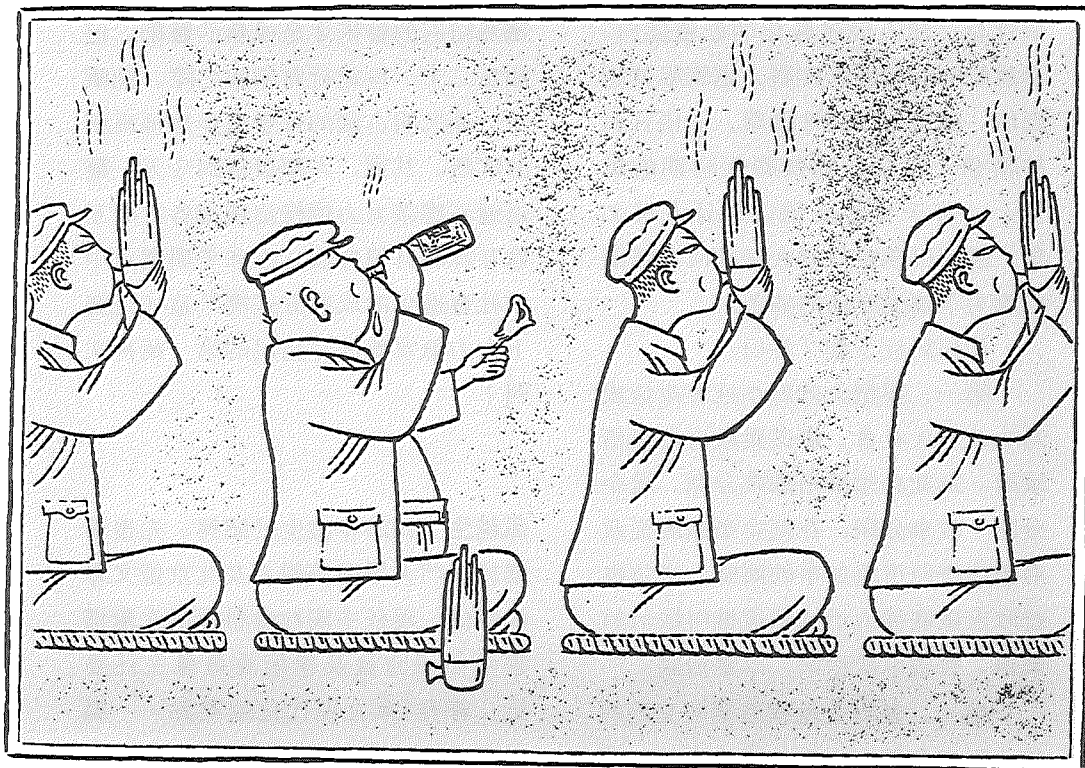
官員隊伍為甚麼總有日益膨脹的趨勢呢？除了人口增加，事務增繁，分工發展，社會進化等正常原因外，這裏面還有一個秘密。

原來，官是權的化身，權是官的靈魂。不管清官濁吏總希望手中權力不斷擴大。權力如何擴大？最便捷的途徑就是被支配者的人數不斷擴大。在權力關係中，上司的權力要表現在他所支配的下屬身上，即把下屬當作自己權力表現的材料。下屬這個人成了他的上司權力的鏡子。上司具有權力的相對價值形態，而下屬則具有權力的等價形態。這和馬克思分析商品價值的兩極是一個道理。擁有一個下屬的上司，他的權力反映在對方的權力價值鏡上，只是自身權力的等值；擁有十個下屬的上司，他的相對權力

就至少增至十倍。所以，自古以來，官僚主義總喜歡加官晉爵，增設機構，招兵買馬，擴充編制，而不怕重床疊架，人浮於事。它聽到機關昇級，單位昇格，就喜形於色。命令它關停併轉，精兵簡政，準會愁眉苦臉，糾紛百出。一句話，官僚主義最喜愛「外延式擴大」，尤其在人治體制下，這種喜好缺乏法制約束，總有機會以求一逞。固定資產投資外延式擴大過猛之所以成為久治不癒的頑症，奧秘就在於此。

官吏既愛隨機膨脹，冗員自必無事生非。天生我口何必閑，地養我身終須樂。於是，文山會海，高調與酒令共鳴；檢查評比，獎狀與游興齊發。正稅之外更有攤派，攤派之餘復添贊助；錢權交易花樣日日新，偽劣產品戲法月月異。存在如此昂貴大政府而不思改革之，所謂把企業推向市場，無非是右手推出，左手拉回而已。

幾千年來，百官喜好膨脹，帝王更其不在話下。帝王的權力價值要相對地由百官的權力等價形態來表現。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說得妙：「這個人是國王，只是因為有別人當作他的臣屬。」所以，帝王自然喜歡臣屬多多益善。而以帝王為首的整個官僚政治的權力，則當然要由人民作為權力等價形態來表現。所以，官僚政治不僅本身日趨膨脹，而且最喜歡人口膨脹。管仲在二千六百多年前鼓吹的「地之守在城，城之守在兵，兵之守在人」的「人手論」和「人兵論」思想一直執中國人口論壇的牛耳，享盡風流，並不奇怪。而中國的馬爾薩斯——韓非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發出的「今人有五子不為多，子又有五子，大父未死，而有二十五孫，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，事力勞而供養薄，故民爭」的憂慮，卻從未得到過中國統治者的青睞，實屬邏輯的必然。所以，已故經濟學家馬寅初先生的功績，不



在於以其《新人口論》步韓非的後塵，而在於以其錚錚鐵骨對抗毛澤東的「人手論」，終於敲響了時代轉折的警鐘。

人口膨脹會導致人口素質下降，官僚膨脹會導致官員素質下降。這種貶值現象還有更為深層的邏輯在起作用。

在沒有法制約束的情況下，首腦的相對權力價值總有一種傾向，要求官員性格劃一，個性越少越好，少到只作為首腦的權力等價形態而存在，作為政治紙幣而存在，即要求官員百分之百地服從上命，遵旨行事，成為首腦意志的反映，首腦權力的鏡子，首腦價值的符號。每個官員只要等因奉此，承上啟下，起傳聲筒或價值鏡的作用，要不了多大的智慧和能力，多高的學識與品德，就能完成這種任務。而那些有個性有能力，憂國憂民直言敢諫的官吏，反而備受排擠打擊，甚至充軍殺頭，誅連九族。所以，人治官僚政治必有一種使官員無個性化、使人民愚昧化的貶值傾向。而越貶值就越要求膨脹，越膨脹就越貶值，最後形成惡性循環，不僅官員的價值，像惡性通貨膨脹時期的紙幣，一落千丈地貶值，而且人民大眾、國家民族也只好在這種巨大怪圈的壓力下遭受貶值的痛苦。

如何對症下藥？答曰：

第一，要把大政府小社會改造成為小政府大社會，變昂貴政府為廉價政府。為此必須嚴格黨政分開、政企分開、政事分開。在把企業徹底從政府懷抱推向市場競爭的同時，必須也把政府徹底從人治的軌道推向法治的軌道，實施以法治國，以憲治國。

第二，要有效地改造單向支配的權力系統為雙向支配的權力系統，確

保人民參政議政的渠道與體制，充分發揮人民和各種群眾團體對政府和官員的監督作用。

第三，治本之道是讓民富，教民智。以此逐步改變官員活動的生態環境與能量交換機制，進而逐步改變其構成與運動形態，使之更加符合現代化的要求，進入主客體良性循環的軌道。

中國歷史上一次以人民利益為旨歸的偉大的社會改造運動，正在鄧小平設計與領航的改革開放的遠大航程中一步步予以實現。這是古老中國能夠躋身於世界新的文明強國之林較晚的一次機會了。因此，與改革開放的勇氣、膽略、毅力、智慧同樣重要的是改革開放所必備的和平與穩定的環境。成熟的民族、成熟的國家、成熟的社會、成熟的人民、成熟的政府、成熟的政黨，對社會改造具有最高的自覺性，完全應該而且能够在和平與穩定的環境中實現改革開放。

可以不必開腸破肚就能排出體內臟器結石的醫術才是成熟的醫術。但願在二十一世紀行將來臨之際，能賦予一個文明古國的社會進步這種高明的成熟。其實，人類發展到今天，難道還不應該大力標榜這種由各方面互勉互諒和自覺自強，在和平與穩定中求社會進化的成熟方式嗎？這才是要下大力氣宣傳的官與民的第一精神文明！

孫越生 1925年出生於紹興。先後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及北京俄文專修學校。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員及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。著有《東方現代化啟動點——溫州模式》及《歷史的躊躇》等。